

张景明◎著

金 银 器

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

金冠饰

由桃形饰、长条状饰和弧形饰组成。桃形饰分大、中、小三种，饰莲花、花瓣、蜥蜴、联珠纹，并镶嵌宝石，多已脱落，大的花纹分多层分布。高2.5~7厘米。长条状饰，上下两端边缘镶嵌绿松石，并作花瓣。弧形饰，饰菱形纹、圆圈纹、草叶纹，并镶嵌宝石。

新月形金冠饰

呈新月形，两端为穿孔的半球。正面以网格纹为地，浮雕梅花、迎春花、荷花、莲茎、菊花等图案。背面饰五片长方形金片，为四个蟠螭组合形状。两侧面以金丝编出回纹、蟠螭纹。

鎏金边荷花银盏

用六个花瓣形的银片铆焊而成，每个花瓣重叠相压，镶饰的金边上有花草纹，盏心为六个花瓣形成的花心，整体造型好似一朵盛开的荷花。

如意纹银盘

敞口，斜腹，圈足。内沿錾刻双纹，内底錾刻如意纹，沿底间墨书“一十九两五分”六字。

金指剔

柄部作双鱼形，对腹，连鳍，张口托仰荷、仰莲，间以联珠纹，柄端为三瓣花形，中穿孔，套圆环。鱼尾后雕出仰覆莲、仰荷、瓜棱，间以联珠纹。柄下接双面斜刃指剔。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金银器

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

张景明◎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 / 张景明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311-05250-8

I. ①金… II. ①张… III. ①金银器(考古)—研究—
中国 IV. ①K87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2772号

策划编辑 李 丽
责任编辑 李 丽
装帧设计 郇 海

书 名	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
作 者	张景明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491千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5250-8
定 价	109.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张景明

1966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先后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佛教文化艺术专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大连大学东北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博物馆副馆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三级教授，艺术学学科带头人，美术学院民族民间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方向、中国史辽宋夏金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提升高校核心竞争力特色学科专门史文化史学术带头人。兼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北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等，担任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学学会东北亚民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协会服装博物馆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学学会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学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常委委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丝绸之路文化产业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长白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动漫产业国际联盟（AIU）特聘实训专家、大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智库专家、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大连市地名智库专家、大连市金州新区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大连市金普新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委和鉴定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研究生学位与教育评估专家、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专家等。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专题考古学、民间美术学、民族文化学。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出版专著13部，主持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文物局全国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13项，获得省市级科研奖励20项。代表作有《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辽代金银器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东北民间美术遗产研究》《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草原饮食文化研究》等。

前言

金银器属于中国考古学专题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内容。考古学资料表明，我国出土金银器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北方草原地区、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其中，北方草原地区发现了我国时代最早的金银器之一。经过历代各个民族的创造和创新，北方草原金银器经历了形成期、兴旺期、深化期、成熟期、鼎盛期、延续与大众期等几个发展阶段，并且在吸收中原文化、南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每一个阶段的艺术风格和文化特征。草原丝绸之路是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问题，也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于1989年、1990年和1992年连续三次组成考察队，对沙漠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年来，又组织考察组对丝绸之路的中国段进行考察，来寻找丝绸之路的起点。2004年7月在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和2005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十五次大会上，我国有关部门的发言人都强调了要与日本、中亚诸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为世界文化遗产。2014年6月中国联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为世界遗产取得成功。这些说明我国对丝绸之路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



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理念,其目的就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本课题作为2011年国家文物局全国文物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课题,通过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考古发现的金银器为载体,研究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诸多问题,对“草原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新形势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看,对唐代金银器的研究力度较大,这方面的著作、考古报告和研究论文比较多见。著作有:陆九皋、韩伟编著《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韩伟编著《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齐东方著《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齐东方主编《花舞大唐春》(文物出版社,2003年)、谭前学著《盛世遗珍:唐代金银器巡礼》(三秦出版社,2003年)、冉万里著《唐代金银器纹样的考古学研究》(日本株式会社雄山阁,2007年)、卢兆荫著《玉振金声——玉器·金银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俄罗斯学者马尔萨克(Б.И.Маршак)的《粟特银器》(«Согдийский серебро, Москва», 1971)、日本学者深井晋司的《镀金银制八曲长杯》(《ペルシア古美术研究》,吉川弘文馆,1967年)等。其中,《唐代金银器》一书共有研究性论文7篇,涉及了银器的冶炼与铸造,金银器的分期、艺术特征等,并选取有代表性的器物164件,附器物线图,每件器物均有简要介绍;全书有器物彩版9幅,单色版293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唐代金银器研究专辑。《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是韩伟先生在《唐代金银器》的基础上,将海内外珍藏的唐代金银器进行汇编,主要是器物的汇编与说明。《唐代金银器研究》以500件有代表性的器物为基础,综合前人研究成果,解决了考古学的分期研究、唐代金银器的历史渊源和兴盛原因的研究、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化关系的研究等重大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学者研究金银器集大成的一部著作。《唐代金银器纹样的考古学研究》应用考古学类型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金银器的纹样进行了综合、系统的研究,从纹样流变史的角度,探讨了唐代各种纹样的渊源关系及其祖型,并以此为视角,探索了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视野下传统文化要素

和外来文化要素的结合方式，将唐代文化的国际性和历史特质放在中古时期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时空环境下进行了新的诠释，取得了新的认识和一系列研究成果。

关于唐代金银器方面的发掘报告、研究论文有：陕西省博物馆《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1972年第1期），喀喇沁旗文化馆《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银器》（《考古》1977年第5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银币》（《考古》1975年第3期），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安新英《新疆伊犁昭苏县古墓葬出土金银器等珍贵文物》（《文物》1999年第9期），郭文魁《和龙渤海古墓出土的几件金饰》（《文物》1973年第8期），丹徒县文教局等《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11期），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82年第11期），徐良玉等《扬州发现一批唐代金首饰》（《文物》1986年第5期），贺林等《西安发现唐代金杯》（《文物》1983年第9期），保全《西安市文管会收藏的几件唐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文物》1995年第11期），李长庆等《西安北郊发现唐代金花银盘》（《文物》1963年第10期），樊维岳《陕西蓝田发现一批唐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王维坤《试论日本正仓院珍藏的镀金鹿纹三足银盘》（《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6年第1期），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日本学者桑山正进《一九五六年来出土的唐代金银器とその编年》（《史林》六十卷六号，1977年），瑞典学者俞博（Bo Gyllensvard）《唐代金银器》（*Tang Gold Silver*, No.29.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7）等。这些报告和论文，针对唐代金银器的某一发现地点或者问题进行论述，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整理。

对其他朝代金银器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较少，但综合性研究的论著和专题性研究的论文较多。代表著作有：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科学出版社，2003年）、朱天舒著《辽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98年）。《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按照器物的质



地和种类分别描述了每件器物的情况，从器物的铭记、形制、纹样及工艺等几方面做全面分析，并对宋代金银器的使用 and 制作进行了研究。关于金银器综合性研究和鉴赏方面的著作有：龚国强著《与日月同辉：中国古代金银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徐湖平编著《南京博物院珍藏系列——金银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铁源著《古代金银铜器》（华龄出版社，2002年），曹燕萍著《金银器流金岁月》（上海书店，2003年），段清波著《中国古金银器》（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孙建华著《内蒙古珍宝·金银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关善明著《中国银器》（沐文堂美术出版社，2004年），张景明著《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杨伯达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金银器1、2、3》（河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陈晓启主编《中国金银珎琅器收藏与鉴赏全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李飞著《中国传统手工艺文化书系·中国传统银器》（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刘道荣《金银鉴赏与工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申秦雁著《解读国宝丛书·精美绝伦的金银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于建设主编《赤峰金银器》（远方出版社，2006年），吕济民等著《中国传世文物收藏鉴赏全书·金银器卷》（线装书局，2007年），刘玉平著《银器》（青岛出版社，2007年），夏风著《古人铸宝·金银佩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夏风著《古人银饰·寓物辟邪》（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华文图景收藏项目组编著《金银器收藏实用解析》（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方东、胡湘燕著《中国古金银器收藏鉴赏百问百答》（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贺云翱、邵磊著《文物名家大讲堂——中国金银器》（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张静、齐东方著《古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李飞著《中国传统金银器艺术鉴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这些论著多数都是将馆藏金银器做简单的介绍，或者属于图录和鉴赏的范畴，只有少数将金银器涉及的各个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研究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考古学界比较少见。在国外，如日本学者原田淑人的《东亚古文化研究·正仓院御物を通して見たろ東西文化会の交渉》，通过日本正仓院收藏的金银器等，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状况。岛田贞彦的《古银铜面具考》（《文物参考资料》1983年第5期），涉及了契丹贵族死后戴银、铜面具的特殊葬俗，并论述了面具的功能和世界范围内戴面具风俗的民族。还有深井晋司的《ペルツア古美術研究・ガラス器・金属器》（吉川弘文馆刊行，昭和四十二

年)、田边藤美的《丝绸之路上的贵金属工艺》等。在国内,杨富学、杜斗城的《辽鎏金双龙银冠之佛学旨趣——兼论辽与敦煌之历史文化关系》(《北方文物》1999年第2期),以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鎏金双龙纹银冠入手,分析了辽代冠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并推及辽代与敦煌历史文化的关系。乌恩的《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论述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金银器装饰特征与西方青铜器、金银器的异同。齐东方的《唐代金银器研究》一书,深刻分析了唐代金银器与西方粟特、波斯萨珊、古罗马金银器的关系,但主要指通过绿洲丝绸之路进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齐东方的《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从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墓葬出土的金银器入手,分析了金银器具有粟特风格,以此反映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状况。朱天舒的《辽代金银器》一书,包括了辽代金银器的出土情况、分期和演变规律、器形、装饰手法、工艺特点、纹样、文化探讨、葬具和服饰、使用、制造,简单地涉及辽代金银器的文化交流。黄雪寅的《契丹族金银器的动物纹样》(《北方文物》2003年第3期),从辽代金银器入手,论述了动物纹的种类和特点、与其他民族的比较、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其他金银器的资料都散见于各个发掘报告中,只是对金银器具体的描述。

本书作者在研究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之时,也对北方草原金银器的考古发现、分类、造型艺术、文化内涵、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如《辽代金银器概述》(《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的金银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论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唐风格》(《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论辽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辽代金银饮食器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1年第1期)、《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第8期)、《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艺术》(《典藏·古美术》[台湾]2005年第8期)、《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造型艺术》(《大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匈奴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象征》(《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辽代金银器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



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前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08年第1期）、《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的唐文化因素》（《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北方草原金银器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早期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隋唐与西方风格的金银器》（《文物世界》2012年第3期）、《巧夺天工铸金银 流光溢彩尽琳琅——中国北方草原金银器艺术赏析》（《艺术市场》2013年第1期）、《匈奴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原文物》2013年第4期）、《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蒙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从明清金银器看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辽代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大连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西夏、金朝的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现象》（《文物世界》2013年第5期）、《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第十四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2005年）、《辽代金银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等。但这些研究成果不够全面和系统，没有以金银器为主线进一步探讨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现象。

本书分十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北方游牧民族产生的背景，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学、民族学研究的思考，以及各个历史时代草原丝绸之路金银器的考古发现、造型艺术、文化内容、文化交流等，探讨了部分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的地位。

一、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在当今的学术界，有的专家认为，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形成三大生态文化区，即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其中，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的定位值得商榷。从中国北方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态变化看，尤其是北方草原地区，考古资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完全处于原始农业、狩猎业时期，并未出现游牧，只是在公元前16世纪或稍早时期，因气候的变化，导致生态环境的演变，随之诞生了以从事牧业经济为主的民族，进而转向游牧式的生

产和生活，同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并形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民族学研究之思考。从最新考证，草原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的开拓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南线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在新疆境内，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指“天山道”。从总体上说，草原丝绸之路东起大海，为横跨欧亚草原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其向南可到中原地区乃至南方地区，向西可达西域诸国、中亚、西亚，一直通到东欧，北接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因此，在内蒙古大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宁夏大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新疆境内等地发现的遗迹和出土的文物中，除本地区独具的特色外，融中原文化、南方文化、西方文化的因素，形成了一个集多种文化为一体的地带。在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国部分，多为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生活和活动之地，游牧文化的兼容性等特点、游牧民族西迁现象又是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三、北方草原金银器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早期丝绸之路的开通。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考古学资料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金属冶炼技术。在夏代晚期，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先民不仅掌握了青铜的冶炼技术，还能铸造各种器物，金银器就是在青铜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的，并形成了最初的类型。到西周至春秋中期，随着青铜文明的高度发展，金银器的制作和装饰水平也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在草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以前，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中亚地区、南俄草原的文化交流已经出现，并且比较频繁，丰富了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内涵。

四、匈奴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匈奴的金银器，由于战国和西汉时期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影响的不同有较大的差别，在造型、工艺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使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的发展出现了兴旺时期。匈奴是一支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春秋末期匈奴日渐活跃，战国时期势力逐渐强盛，占据了大漠南北。西汉初期建立中国北方地区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匈奴民族出现后，以尚武精神驰名欧亚，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这在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中可得到证实。匈奴的西迁，标志着草原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并在匈奴金银器的装饰艺术中有充分的表现。

五、鲜卑金银器及其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拓跋鲜卑从



大兴安岭北端南迁，到达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南的和林格尔地区，先后建立了代和北魏政权，进而入主中原地区，迁都洛阳，彻底打通了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在南迁过程中，社会组织由原始部落制转化为奴隶制，又转变为封建制，其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慕容鲜卑主要活动于辽西地区，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等政权，多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在鲜卑的遗物中，金银器最能体现其草原风格的特征，造型艺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并具有一定的文化寓意，部分器物的制作工艺和装饰艺术受到了来自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六、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金银器窖藏。1956年，在内蒙古凉城县西北25公里处的东十号乡小坝子滩村发现了一处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13件。窖藏所处的位置在历史上曾经是拓跋鲜卑的活动区域之一。从器物的铭文、特征和造型看，为拓跋鲜卑猗廋部的遗物，既有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又继承了匈奴金银器的装饰风格，还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色，说明窖藏所在地是处于中国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

七、论白道城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北魏初期，为了保卫首都平城（故城在今山西省大同市区），防止阴山以北柔然的侵扰，在北部沿边设置了六个军事要镇，自西而东分别为沃野镇、怀朔镇、武川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其中，武川镇是当时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设立的唯一军镇，在其南部通往平城的交通咽喉要道处建造了白道城，作为南北和中西交往的必经要塞。随着战争的发生，其功用在经济、文化方面越显突出，甚至可与军事方面的作用相提并论。草原丝绸之路虽然早已开通，白道城的建造，无疑为中西和南北方经济、文化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在隋唐以后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比如出土古罗马金币的水磨沟和出土波斯萨珊银币的坝口子村，在阴山南麓，正处在从唐朝都城长安，经单于都护府，直通阴山以北的大道上，都是通往阴山南北的重要通道口。

八、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隋唐与西方风格的金银器。隋唐时期，在北方草原地区活动的民族主要有突厥、回纥（回鹘），在所发现的遗物中，金银器占有一定的数量。这一时期，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的逐渐繁盛，中西文化、南北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并在金银器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从现有出土的北方草原金银器看，既有北方民族的产品，又有粟特、古罗马、波斯萨珊等西方风格的器物，还有数量较多的唐代风格的制品。从总体上看，隋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繁盛时期，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却是文化繁荣的前

奏期。当时，突厥、回纥主要活动于草原地区，在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地处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在势力最强大时曾经扩展到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反映在文化方面，把拜占廷、伊朗、印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充当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递者，并将不同文明融入自己的文化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文化内涵，包括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为后来草原地区金银器的鼎盛与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创造了更大的有利条件。

九、辽代金银器的造型艺术与文化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当时辽朝统辖的区域内发现许多遗迹，出土了大量遗物，其中金银器就有数千件，以其精致的制造工艺和繁多的种类，使古代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达到鼎盛时期。金银器的种类从用途上分饮食器、妆洗器、装饰品、鞍马具、殡葬器、宗教用具和日杂器等七大类。从金银器的考古发现和造型艺术看，辽代是北方游牧民族所发现的金银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为齐全的一个朝代。这些金银器不仅反映了契丹民族的游牧式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有许多社会功能。通过金银器可以说明契丹民族森严的政治制度、神秘的埋葬习俗、独特的祭祀形式和奢侈的宴饮生活。

一〇、辽代金银器的外来文化因素。辽代金银器的制作取得一个前所未有的成就，而外来文化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器形、纹饰到制作工艺，均有许多酷似唐代金银器的艺术特征，在唐代同类器物中可以找到直接的模板。辽承唐制，辽代金银器第一、二期对唐朝的效仿，不仅沿着晚唐作风继续发展，而且挖掘和继承了唐代前期的模式，并不自觉地简化、涣散，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己的特色。辽代金银器的器物造型、纹饰布局、制作工艺，其外来文化因素除了影响巨大的唐文化、宋文化因素以外，还直接、间接地受到印度、中亚及本地先民文化因素的影响，它们在辽文化中占同等重要的地位。契丹崛起后，向西北边境扩张，保证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畅通无阻，高昌、于阗等国成为辽与中亚波斯、大食等国联系的桥梁，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传入。辽代金银器中的多曲形器的原形渊源于粟特地区银器，它直接地或通过唐代金银器作为媒介间接地影响了辽代金银器，摩羯纹等图形则是通过唐朝间接吸收印度佛教艺术的因素。契丹男子装饰的金属鞞蹰带来自于唐代崇尚的胡俗，溯其渊源则是活动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突厥的传统束腰。在辽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中，动植物纹多数都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代表了当时皇家贵族的祈福心理和追求仕途升迁、生活安详的愿望。



一一、辽代冠带类型与文化交流现象。辽代的金属冠带，是契丹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契丹舆服制度的集中表现。契丹建国前没有严格的冠带制度，在建国以后受到中原王朝礼仪的影响冠带制度形成，并且最初是有严格制度的，针对契丹人和汉人的不同采取了分治的政治制度，反映在服饰上也是有区别的，即契丹人穿本民族的服饰，汉人穿汉式服饰。到辽代中期以后，这种服饰上的差别有很大改变，契丹人可以穿汉服，汉人也可以穿契丹服。而契丹皇帝和大臣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冠带类型。同时，冠带在辽朝与其他国家的往来中，在皇帝与大臣的人际交往中，在敬老风俗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金银冠带特殊的社会功能。

一二、西夏、金代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从发现的西夏和金代金银器的器形、纹样和工艺来看，继承了唐宋时期的风格，西方文化的因素不太明显，虽然有源于印度佛教文化艺术的造像，但已经中国化了。多曲式银器的渊源在中亚地区，西夏和金代的多曲式金银器在风格上已经是从唐宋文化中转借过来的，并不是直接从西方国家传入。可是，此时的草原丝绸之路仍在繁盛，中西文化交流还在频繁往来，西夏正处于沙漠丝绸之路的咽喉，从其东行可以进入草原丝绸之路，沟通西夏与辽朝、金朝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宋地和西方的金银器，必然经过辽、西夏、金朝的境地，走草原丝绸之路而传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促进了西夏、金朝与宋朝、西方国家的金银器文化的交流。

一三、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蒙元金银器发现与研究。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元代金银器，是在宋代金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造型、纹样和工艺上延续了前代草原金银器的风格，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从总体上看，元代金银器与宋代接近，银器的数量超过金器，草原地区发现的器种主要为装饰品，还有诸如碗、盘、杯等生活器皿和游牧人所用的鞍马具。尽管自己的风格很浓厚，但有的器物造型和纹样仍然具有唐宋和西方文化的风格。如集宁路古城所处的位置是元朝的一个樞场，是北方草原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元世祖统一中国后，江南地区的丝织品、金银器、瓷器等大量输入北方草原地区，使集宁路成为当时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纽带，说明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今内蒙古地区，融汇了中原地区的商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运往西方国家，并把西方诸国的商品通过该道经草原地区输入中原地区。

一四、明清时期草原丝绸之路金银器的研究。北方草原地区明代的金银器发现甚少，不能具体做比较研究。清代时期，清政府为了加强与蒙古

族的关系，采取了联姻方式，有许多公主嫁往蒙古草原地区，并带来许多金银制品。同时，民间佩戴金银首饰的现象增多，促进了金银贵重品向民间化和大众化发展，使蒙古族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民间制作的金银器风格。但从金银器的发展过程看，这一时期在中亚地区原来盛产金银器的诸国都已分崩离析，而海上丝绸之路却逐渐繁盛，代替了草原丝绸之路和沙漠丝绸之路的地位，从而导致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在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明清金银器中，很难看到有西方文化的因素，用事实说明了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衰落状况。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作为草原丝绸之路东段的起点，贯通了草原丝绸之路的中、东部地区。在早商时期，北方草原地区开始由农业民族向游牧民族转变，从此，有山戎、东胡、匈奴、乌桓、鲜卑、敕勒、柔然、突厥、回鹘、奚、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先后活跃在这个历史大舞台，各自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对开拓中国北部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从大约距今四千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就已经发现，历经春秋、战国、魏晋、隋唐的发展，到辽代契丹民族占据草原时期达到了鼎盛，元代以后继续发展，形成了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的发展序列。

北方草原地区出土的金银制品，是在青铜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的，并很快达到一个兴盛时期。西汉以前，金银制品的制作工艺和纹饰艺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战国时期匈奴的金银器，受到来自黑海沿岸、北高加索地区斯基泰文化的冲击，纹饰则取材于草原上常见的动物，既有野生动物，又有家畜，还出现动物间争斗、咬斗的草原生活场面，形成独特的金银器艺术风格。西汉时期，随着汉和匈奴间战争与和亲交替局面的出现，汉文化也不断传入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又多融汉代的风格，反映草原上动物间弱肉强食的纹饰减少，更多的是讲究对称布局的图案。

东汉时期，鲜卑的金银器遗留有匈奴的风格，同时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纹饰多为草原上常见的动物，布局讲究规划整齐，即表现单体动物或同种动物的重复排列。温驯动物（马、羊、鹿、驼）增多，凶猛动物（虎、狼）减少，还有传说中的神兽动物。两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神兽、怪兽、瑞兽纹大量流行，在类别上除传统的装饰品、兵器饰件、车马饰件外，出现少量的生活器皿，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西方（波斯等）舶来品。隋唐时期，中原文化、西方文化随着中西方文化和南北文化的交流，不断传入北方草原地区，使金银器的造型和艺术风格发生重大变化，许多金银制品从唐朝和西方地区直接传入。类别多为生活器皿，装饰品的数量减



少,带有北方民族特色的器物较少。纹饰以狮、鹿、摩羯、鱼、卷草、忍冬、缠枝花为主,构图严整,讲求对称。辽代早中期,金银器多受唐代金银器风格的影响,生活器皿和随葬器盛行,类别包括殡葬器、饮食器、收洗器、鞍马具、装饰品、宗教用具、日杂器等。纹饰常见龙、凤、摩羯、狮、鹿、羊、鸳鸯、鸟、昆虫、鱼、牡丹、莲花、卷草、宝相花、盘带花,还有人物故事,以环带夹单点式、散点式和满地装的手法装饰,布局上讲求对称、严谨。辽代晚期的金银器主要受宋文化的影响,或从宋地传入,纹饰出现随意自由式,与造型取得和谐统一。制作工艺更加精湛,达到了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西夏和金代金银器发现的数量较少,其纹饰、造型、工艺多融有唐宋文化的因素。元代以后,金银制品继续得到发展,虽然有西方的造型,但中国化的风格日渐浓厚。到明清时期,已向大众化、世俗化发展。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通过金银器的物质载体,了解历代北方民族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在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交流的状况,厘清草原丝绸之路的各种文化现象。研究思路上,在掌握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对草原丝绸之路东段沿线出土的金银器进行实地调查,将金银器的有关资料尽可能地全部收集起来,进行分类、分期和特征的研究,进而探讨草原丝绸之路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发展脉络、文化交流等内容,分析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及资料,还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资料,跨学科综合性研究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可以研究历代北方草原金银器的类型、分期、特征、文化交流等。历史学中的文献分析方法,有助于研究各民族的发展历史、社会经济、丧葬礼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民族学的直接参与观察方法,指导对金银器的资料收集和对文化内涵的分析。艺术学中的造型艺术原理和方法,对金银器的器形、纹样、装饰手法、工艺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北方草原金银器的文化内涵以及与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现象的关系。

目 录

- 一 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 1
 - (一)原始时期的生态环境 / 2 (二)草原生态环境的形成 / 7 (三)游牧文化出现的历史背景 / 9
- 二 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民族学研究之思考 18
 - (一)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游牧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状况 / 19 (二)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古遗迹及出土的金银器 / 36 (三)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几点思考 / 62
- 三 北方草原金银器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早期丝绸之路的开通 73
 - (一)新石器时代的制作工艺与铸铜技术 / 73 (二)早期青铜的冶炼与铸造技术 / 75 (三)青铜文明的繁盛 / 79 (四)北方草原金银器的初期发展 / 84 (五)早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与金银器文化交流 / 88